



任伟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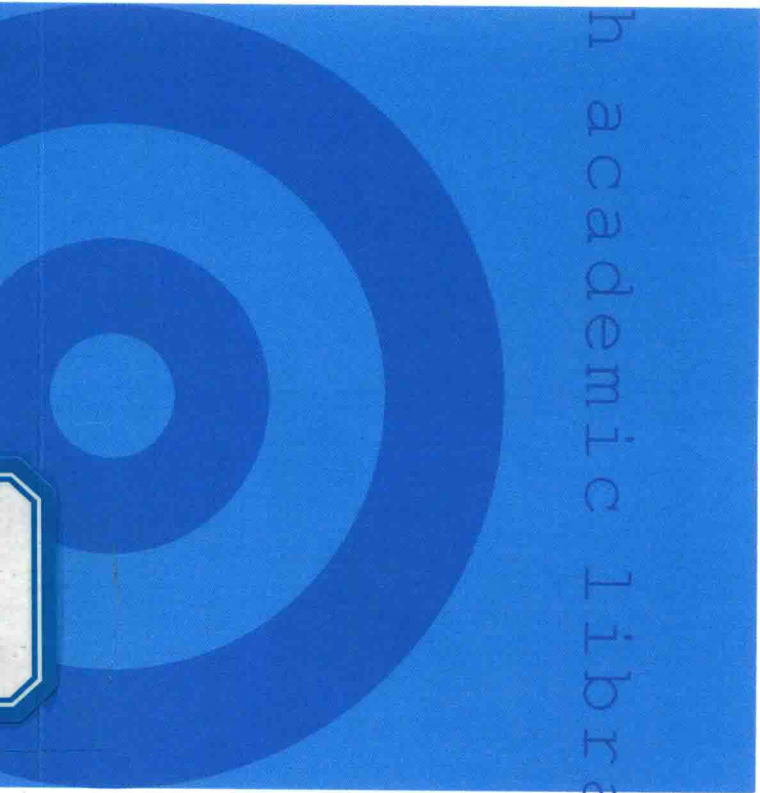
著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本书利用档案、期刊、地方志等史料，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调查进行了系统研究，既有宏观论述，又有微观分析，力求做到点面结合。

岳麓书社

Youth academic library



Subscription price, \$5.00 per annum in advance.
Single copies, 15 cents.

1903

1904

1905

1906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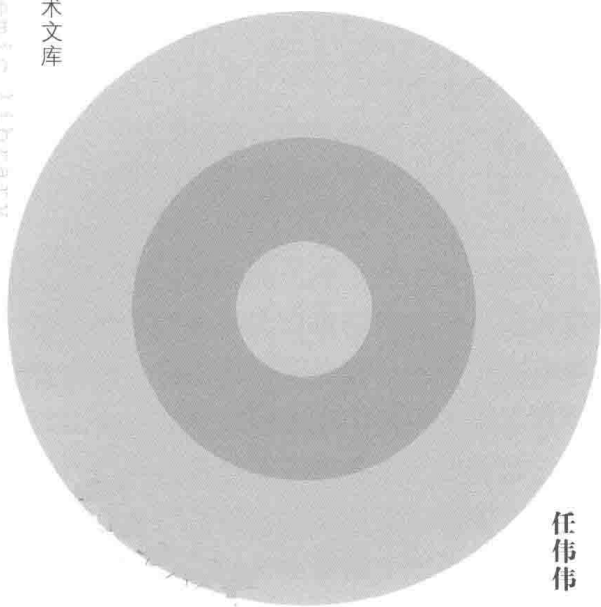
任伟伟 著

岳麓书社·长沙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任伟伟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7. 1
ISBN 978-7-5538-0512-2

I. ①南... II. ①任... III. ①社会调查—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D693. 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6358 号

NANJING GUOMINZHENGFU SHEHUI DIAOCHA YANJIU

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

作 者:任伟伟

责任编辑:胡宝亮

责任校对:舒 舍

书籍设计:萧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6.875

字数:232 千字

ISBN 978-7-5538-0512-2

定价:38.00 元

承印: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 言

提及社会调查，今人已不陌生。然而在百年前的中国，它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生事物。自西方引入之后，社会调查在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大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历了从萌芽到产生再到蓬勃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政府管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数据。近年来，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民国史所倚重的重要材料，其丰富的史学价值正在逐渐被挖掘，但是学界对其在近代政府管理方面的研究价值则较少涉及。任伟伟《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一书对于全面认知近代政府社会调查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政府社会调查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中经北洋政府时期，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规模。作者为写作此书，查阅了大量资料，全面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主持的社会调查，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风貌。

该书首先对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进行了整体研究，然后选取了国防设计委员会与资源委员会、地质调查所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并且将山东省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典型进行分析，力求点面结合，全面展示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的整体面貌；另外该书分

别对南京国民政府、地质调查所和山东省政府的社会调查数量做了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分析，力求反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调查的整体状况和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注重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数据的结合，巧妙地实现了整体研究与个案分析、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的相辅相成，科学方法的运用无疑使本书增色不少。

当然，本书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在理论支撑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任伟伟是在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就读的硕士，进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攻读博士之后，我是她的指导老师之一，她作为一名博士生，刻苦努力，虚心好学，是同级学生中的佼佼者。本书是其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内容丰富，观点中肯，读者尽可以评析。

任伟伟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我希望这位年轻的学者继续发扬山东大学历史系刻苦努力、严谨治学的优良传统，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做出更优异的成绩，撰写出更加引学界瞩目的学术研究专著。

是为序。

吕伟俊

2014年7月20日

县人口农业总调查为例	092
第三章 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活动	106
第一节 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总体状况	107
第二节 翁文灏与中国近代地质调查	123
第三节 丁文江与中国近代地质调查	137
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起用翁文灏、丁文江的原因分析	152
第四章 地方政府社会调查模式之考察：以山东省政府社会 调查为例	157
第一节 山东省政府社会调查的总体状况	157
第二节 以邹平实验县户口调查为例窥探政府调查方法	176
结 语	182
主要参考文献	187
附 录	202
致 谢	212

绪 言

一、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肇兴于清末，活跃于民国，尤其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高潮，时人称之为“社会调查运动”。此次运动参与主体广泛，从民间到政府纷纷参与其中，内容多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并运用了西方先进的理论，包括现代经济学、统计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成果卓著，为我们呈现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展示了民国社会生活的场景。时人之所以热衷于社会调查，一方面是出于学术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建设国家的需要，然而更多的是二者兼而有之，可以说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双重内涵。如果将调查主体具体界定到政府，毫无疑问，其社会调查目的更加倾向于国家建设和社会改良，南京国民政府正是如此。因此全面认知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的勃兴，对于了解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改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大量社会调查资料是反映民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记载着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巨变，近年来已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据此写成了一系列受学术界普通关注的著作。但是由于材料比较零散冗杂，对其搜集整理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再加上以前对于社会调查学术史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系统地阐述和分析这些调查材料的著作尚未出现，这是民国史研究的一大缺憾。然而，辩证地看，它又是开启民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关键，正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责任编辑张永钦所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对我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学术系谱兴起的记录，对现代学科学术流派兴起史的研究和现行教育都有着宝贵的参考价值。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观点，这也是研究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所在，具体表现在：首先，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重视社会史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马克思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① 社会调查资料正是研究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当时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反映，是我们考察时人生活的重要历史资源，对其探讨有助于丰富民国社会史的研究。其次，将社会调查作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一种新兴的社会行为和学术活动方式，来加以整体关注和专门深入的研究，这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涵。社会调查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本身属于社会学，所以对其进行研究，特别是对其中的社会调查方法的探讨则有利于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理论，促进历史社会学以及历史

①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50.

统计学的发展。第三,丰富了社会学史的研究。由于社会调查最初被定义为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我国最初的社会调查也大多是由社会学家主导的,因此,在回顾社会学史的时候,社会调查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调查在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此,正确地分析和利用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资料对于民国史的研究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3. 现实作用

“史学研究的功用不仅仅在于重建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还在于为当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有现实价值的理论指导与借鉴。”^① 本书符合这一要求。我国实地社会调查发轫于清末,随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传入,针对中国现状的社会调查也逐渐兴盛起来,这种调查为解决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现实的依据。时至今日,调查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常规化的研究手段和技术。然而,20世纪初的社会调查自始至终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其调查成果“凝聚了代表当时比较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各种自然、社会及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透视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②。

二、学术史综述

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古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

① 吕伟俊. 序 [M] // 聂家华. 对外开放与城市社会变迁——以济南为例的研究 (1904—1937).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序 (2) 3.

② 李文海. 前言 [M] // 李文海, 夏明方, 黄兴涛.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文教事业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前言 2.

调查则肇兴于 18 世纪的欧洲。中国在 19 世纪末出现了社会调查，并逐渐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人士。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调查运动，并由此推动了官方社会调查的发展，晚清政府社会调查即是如此。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为了稳固其统治，开始采用这一先进的方式为其新政保驾护航，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批重要的调查资料。如果说晚清政府的社会调查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话，那么民国政府的社会调查则已是枝繁叶茂了。我们常常用运动来形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发展，足见当时社会调查规模之巨大、影响之广泛。近年来，这批调查资料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一）材料整理工作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浩如烟海，但对其的整理利用却相对滞后。近年来，在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主要取得如下成果：

美国中文资料中心和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出版了《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共 200 册，由萧铮主编，这些资料主要是 1932—1940 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的学生通过实地调查，对全国 19 省 180 余市县土地问题所作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共有 166 篇论文、178 篇调查报告，此外还有大量的调查日记，是研究国统区土地问题的宝贵资料，已为不少学者所引用。这套资料是当时地政学院的学生为准备硕士论文而进行的社会调查成果，它的优点是调查者的文化素养比较高，调查报告具有较高的水准，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那就是调查者在选择调查区域时，多数会选择自己的家乡，这就产生了一个样本可信度的问题。另外调查者在进行调查时，偏重于官方资料，真正深入地方的比较少，纵有深入地方者，也常有官员的陪

同，使得农民不敢讲真话，因此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

另外，日本东京岩波书店 1952—1958 年出版了《中国农村惯行调查》，这是根据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在中国华北、东北等地的调查结果编写的，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资源等方方面面，共六卷，是日文版。由于当时日本进行调查具有为侵略中国服务的本质与特性，因此这批调查资料也为中国人所诟病，但这些调查资料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引用。

由李文海先生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是突破民国社会调查材料零散这一弊端的开山之作，它收录了 193 种文献，其中包括一些当时印行的书籍、论文以及一些手稿和油印本，采用丛编的形式，按内容分为十卷，包括文教事业、乡村社会、宗教民俗、城市（劳工）生活、底边社会、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社会保障、人口、少数民族等方面，不但为我们了解民国社会提供了翔实而又宝贵的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学术调查史的第一手资料。后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三编）》也相继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入选的都是各领域中非常经典，但一般又不易查找的调查资料，这为研究民国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同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也有一些已经结集出版，如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里面收录了毛泽东在苏区进行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几个调查都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进行的；又如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的《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此外，尚有大量的调查资料散见于各种资料汇编中。

（二）研究现状

1. 整体性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人对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进行研究，比如李景汉、刘育仁。尽管李刘二人均写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前者刊于《社会学界》1927年第1卷，后者为燕京大学学士毕业论文）题对于当时社会调查状况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们针对的时间段是不同的。李景汉的文章时间段界定为1914—1927年，刘育仁的文章则为1928—1935年，这种时间段的不同也使得他们论述的运动的阶段是不同的，李景汉描述的是运动的初步萌芽和发展阶段，而刘育仁则将关注点集中在运动的高潮部分。李景汉简单回顾了社会调查运动十余年取得的成就，强调了社会调查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于改良社会有极大的帮助，指出了当时在中国从事社会调查所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希望与政府合作培养社会调查人才的想法。总的来讲，这篇文章是一种概括性的描述，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刘育仁的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成果量化，以统计数字的形式精确地表现了1928—1935年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内容、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情况。这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有着很大的贡献，事实上就是社会学方法之一——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他通过统计数字得出结论——社区研究正在取代社会调查。但该文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因为当时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正处在纷争阶段，作者倾向于证明社区研究的正确性，从而忽视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复杂性。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待当年的纷争，我们也许会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过去一段时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史并没有受到重视。最近几年，局面有所改观，出现了不少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王万俊的《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与社会调查方

法的运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方法的构成解析》是一篇博士论文，该文主要是从调查方法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作者将社会调查方法分为研究型和应用型，并且指出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基本特征，这对我们考察民国时期社会调查方法颇有裨益。

中国人民大学李章鹏的《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1897—1937》也是社会学史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一篇博士论文。文章探讨了现代社会调查兴起的过程及其表现，并且以个案的方式透视了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学术现代化及社会改造的关系。作者对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肇兴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并且搜集到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资料比较全面，但他主要是从社会调查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探索的，对于社会调查与社会发展层面关注较少。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内以李文海先生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清末民初社会调查的团队。近年来成果突出，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李章鹏在资料整理方面的突出贡献之外，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福建教育出版社以“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为题联合举行了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标志着清末民初社会调查研究在学术界已开始受到重视。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社会调查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方法，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兴涛和夏明方教授还将这次研讨会的内容收录在《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①一书中，其中数篇论文对清末民初社会调查运动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做了分析，认为社会调查对近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程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现代社会科学的发

① 黄兴涛，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展也为社会调查的勃兴提供了助力。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学术史的研究,目前专门的论著比较少见,但是散见于大量有关社会调查方法的书籍中。这些书中都有关于社会调查史的回顾,但在讲到民国社会调查时,比较重视的是民间社会调查,对于政府所做的社会调查着墨不多。

2. 专门性研究(从调查内容的角度划分)

关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划分方式有多种,可以按照不同的调查主体进行划分,也可以按照不同的调查内容进行划分。本书在此按照调查内容对已有的社会调查成果进行划分。

农村调查:

关于民国时期的农村社会调查,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并且整体性研究居多。

陶诚认为1925—1935年中国掀起了一股农村调查热,调查不下9000次之多,他按照不同的调查主体对于当时的农村社会调查进行了概述。^①据笔者所知,这是最早的一篇按照调查主体的不同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进行分类描述的文章,其后很多人的文章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比如侯建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述评》^②、张泰山《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③、郑清坡《试论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的兴起与发展》^④等文,均试图按照不同的调查主体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状况做一整体的描述。陶诚的文章是民国农村社会调查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是该文

① 陶诚. 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调查[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0(3): 92—98.

② 侯建新.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述评[J]. 史学月刊, 2000(4): 125—131.

③ 张泰山.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1): 80—85.

④ 郑清坡.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调查的兴起与发展[J]. 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8(1): 88—90.

在论述方面相对简单。

相比以上成果，郑清坡《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与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兴起》一文则更为深入。他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兴起发展的过程及原因，尤其是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文章的突出之处是对当时的农村经济调查与现代农业经济学兴起的历史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①

曹幸穗《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②一文对民国时期不同调查主体进行的中国农村调查进行了述评，着重分析了这些调查资料三方面的缺陷。同时曹幸穗也认为民国时期的农村经济调查，尽管由于调查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和出发点不同，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侧重点不同，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基本上都采用了经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或多或少地包含了某些科学的成分，这与民国之前的农业经济史资料有着本质区别。但是该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那就是调查主体不全面，没有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包含在内。在1999年9月东京召开的“中华民国期的经济统计：评介与推计”国际研讨会上曹幸穗教授提交了这篇论文。

另外，有学者对主持中国农村调查的著名人物进行了研究，并且采取了新的视角。卜凯是个非常有争议的农业经济学家，盛邦跃撰文为其正名，他在《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③一文中分析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两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

① 郑清坡. 民国时期农村经济调查与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学的兴起 [M] // 黄兴涛, 夏明方.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191—238.

② 曹幸穗. 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 [J]. 古今农业, 1999 (3): 15—26.

③ 盛邦跃. 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 [J]. 学海, 2001 (2): 119—123.